

波斯灣戰爭後中東新局勢

吳釗燮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兼編譯出版組組長

一、前言

波斯灣地區在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七日爆發戰爭。截至戰爭爆發時為止，參戰雙方集結對峙的部隊數目超過一百二十萬人。根據報導，伊拉克所集結的坦克有四千餘輛，戰機五百架，約五十五萬的陸軍部隊，並有改良的飛毛腿飛彈上百枚可以運用。多國部隊的戰車有三千七百輛，陸上部隊大約七十萬人，海上艦隻超過一百四十艘，分佈在波斯灣、紅海、地中海，另外還有戰機約有兩千架。①無疑地，這是自越戰以來最大規模的一場戰爭。

該場戰爭的結束，是於台北時間二月二十八日由美國布希總統宣佈。歷經四十餘天的戰鬥後，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摧毀了伊拉克四千多輛坦克中的三千七百輛，兩千八百多輛裝甲運兵車中的一千八百多輛，三千多門大砲中的兩千門。而聯軍方面的損失則微不足道。②此外，伊拉克有限的海軍全數遭到摧毀，空軍戰機也多數被毀於地面上。其生產生化武器的設備，也在轟炸中悉遭摧毀。很簡單的說，波斯灣地區的強權伊拉克，在多國部隊的優勢武力的攻擊下，在短期內已經不再具有威脅該地區任何國家的能力了。

撇開伊拉克人侵科威特造成波斯灣危機的近因，單純從戰爭發生的遠因來看，可以說是波斯灣地區的權力分配失去平衡，造成美國必須以其軍力介入該地區，以維護地區的穩定與安全。但波斯灣地區到底為何失去平衡？戰爭造成何種新的地區形勢？戰爭之後的地區安全體系如何重新安排？該地區的穩定與安全如何維持？西方國家主導的權力安排會不會有任何反作用？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本文將試著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來探討這些問題。

註① Time, January 28, 1991, pp. 14-5.

註② 聯合報，民國八十年三月一日，第三版。

二、戰爭前的波斯灣權力分配狀態

波斯灣地區的權力分配發生大變動，是在一九七九年伊朗發生革命之時。在伊朗爆發宗教革命之前，沙皇巴勒維的政權是西方石油利益的代言人，而且在美國的支持下，伊朗強大的軍力，是維護波斯灣地區穩定的最大保守力量。^③在伊朗革命發生之前，波斯灣地區的唯一激進政權是伊拉克，惟伊拉克的軍力無法與伊朗相抗衡，因此對波斯灣地區的影響也不大。（見表一）

表一：波斯灣地區國家軍力比較，一九七八—七九

	總兵力 (千人)	陸			軍			海		空		軍	人口 (千人)
		人數(千人)	坦	克	運兵車	大	砲	人	數	艦隻	人		
伊拉克	二二二	一九〇	一、九〇〇	一、七〇〇	九三〇	四、〇〇〇	四九	二八、〇〇〇	三三九	一一、七三〇			
伊朗	四一五	二八五	一、九八五	八二五	七一〇	三〇、〇〇〇	三九	一〇〇、〇〇〇	四四七	三九、三三〇			
沙烏地	四四·五	三五	三五〇	六〇〇	—	一、五〇〇	一三四	八、〇〇〇	一七八	七、八九四			
巴林	二·三	二·三	—	—	—	—	—	—	—	—			
卡達	四·七	四	一二	五〇	—	—	—	—	—	—			
大公國	二五·一	二二·五	三〇	一四八	—	—	—	—	—	—			
阿曼	一九·二	一六·二	—	三六	—	—	—	—	—	—			
敘利亞	二二七·五	二〇〇	二、七〇〇	一、六〇〇	—	—	—	—	—	—			
約旦	六七·二	六〇	五〇〇	八七〇	—	—	—	—	—	—			
以色列	一六五·六	一三八	三、一五〇	四、〇〇〇	—	—	—	—	—	—			
科威特	一一·一	九	二八〇	二五〇	—	—	—	—	—	—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tary Balance, 1978-1979, 1978*, Brassey's Great Britain, pp. 37-47.

伊朗發生革命對波斯灣地區的保守王權政府是一大震撼，原來扮演保守主義守護者的巴勒維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由

註③ Charles A. Kupchan, *The Persian Gulf and the West: The Dilemmas of Security*, 1987, Allen & Unwin, Boston, p. 68.

柯梅尼領導的極端宗教主義政府。柯梅尼倡導宗教革命輸出，這對多數人民與伊朗人同屬什葉派的伊拉克政府，以及有什葉少數的波斯灣地區保守王權國家形成威脅，深懼什葉派的回教徒也附和伊朗的革命號召。^④海灣地區的保守王權國家，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巴林、卡達、阿曼，也在這背景下於一九八〇年十一月組成海灣合作理事會（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⑤

波斯灣保守主義國家在失去伊朗作為地區的穩定力量之後，又面臨極端基本教義派的挑戰，因此受威脅的這些國家感同身受，自然的形成一股反伊朗的力量。而敘利亞與伊拉克的執政集團雖同為巴斯黨（Ba'ath Party，阿拉伯民族社會復興黨）却因為互相爭奪領導權而長期處於敵視狀態。同時，雖然柯梅尼在革命期間居住於伊拉克境內，在革命成功之後却因為呼籲伊拉克人民推翻政府，建立以伊朗為模式的宗教政府，因而與伊拉克的執政者相敵視，敘利亞也因為與伊拉克的舊有矛盾而與伊朗成為自然的盟友。在這段混亂的時期，伊朗的武力因為革命以及西方國家的禁運措施而受到大幅削弱，^⑥因此對保守政權和伊拉克的威脅除宗教革命之外，軍事上並不構成很大的威脅。所以在這時期的波斯灣地區是處在一種很不穩定狀態之中。

一九八〇年伊朗與伊拉克的邊界衝突演變成戰爭時，雙方正處於一種微妙的平衡狀態，一方面，伊朗的武力因為革命而削弱不少，另一方面，伊拉克與其他波斯灣王國的戰力也不是非常強大，（見表一）這也是為什麼兩伊之間的戰爭持續八年之久，却難以分出高下的最大因素。但是在兩伊戰爭的期間，伊拉克受到波斯灣地區盛產石油的王權國家之大力支持，自西方國家購買精密武器，並實施動員，因此軍力增加迅速，成為地區性的強權。到波斯灣戰爭爆發之前，伊拉克的軍力已非該地區任何國家所可比擬。^⑦其所號稱的世界第四大地面武力也非全然虛假。（見表二）在伊朗與伊拉克之間達成停戰協定，正式結束兩伊戰爭時，伊拉克對波斯灣地區國家所能造成的威脅，已遠超過伊朗。因此伊拉克一夜之間攻下科威特，才讓波斯灣地區的小王國與西方世界驚覺事態的嚴重性。

註④ Thomas Naff (ed.), *Gulf Security and the Iran-Iraq War*, 1985, Th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Middle East Research Institute,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D.C., pp. 13-6.

註⑤ *Ibid.*, p. 17.

註⑥ Anthony H. Cordesman, *The Iran-Iraq War and Western Security: Strategic Implications and Policy Options*, 1987, The 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London, pp. 26-7, 65; Shahrnam Chubin and Charles Tripp, *Iran and Iraq at War*, 1988, I.B. Tauris & Co Ltd., London, p. 33.

註⑦ Chubin and Tripp, *op. cit.*, pp. 93-4, 108-20.

美國在兩伊戰爭中的政策，是維持區域的均衡，^⑧因此，在一九七九年開始的戰爭之中，美國的態度一直很曖昧，一方面樂見海灣地區小國王支持伊拉克對伊朗的戰爭，並對伊拉克攻擊油輪的行為加以默許，直到伊拉克以飛魚飛彈攻擊史塔克號戰艦，才將雙方往來合作的行為公開化。^⑨但同時，美國與伊朗之間也透過以色列的穿針引線，進行各種軍事的交易，^⑩這種兩面支持的作法，目的就是讓兩伊之間能繼續衝突，以削弱彼此的軍事力量，避免兩國之一成為地區的強權，威脅波斯灣的保守勢力。但是當伊拉克突然不顧與海灣合作理事會的關係而向科威特進軍時，區域權力關係乃失去平衡，也顯示地區國家無法嚇阻伊拉克的侵略行動。

三、戰爭對地區權力分配造成的改變

如前所述，伊拉克在戰爭之後，主要軍事武力大部份遭到多國部隊的摧毀，其軍力不但無法再度面對佔領南部廣大地區的多國部隊，和伊朗與敘利亞比較起來也明顯的成爲一個弱國。更有甚者，因爲伊拉克武力遭到嚴重的打擊，而且南部地區遭到占領，使得各地反抗巴斯黨統治者有機會掀起各種事件。因此，即使胡辛與巴斯黨的統治未被完全推翻，其統治力量顯然已經遭到相當程度的削減。

除了伊拉克成爲一個弱小戰敗國的明顯事實之外，一些微妙的變化也正在這個地區醞釀著。首先，就是阿拉伯世界中原來的激進、保守分際已被打破，形成一個「親美」、「反美」的分裂態勢。海灣合作理事會的六個成員國成爲阿拉伯國家中親美集團的主幹，加上原屬保守的埃及和原爲激進國的敘利亞，構成整個親美集團。原來保守、親美的約旦因爲國內居多數的巴勒斯坦人在戰爭之中非常支持伊拉克，迫使約旦政府與伊拉克站在同一條陣線上，因而在戰後受到親美集團的敵視。另外，葉門共和國和蘇丹也因爲支持伊拉克而成爲反美集團的國家。北非阿拉伯國家的態度較爲曖昧，雖然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出兵至波斯灣與美國並肩作戰，但是由於這些國家的人民掀起難以抑制的反美浪潮，因此都一方面譴責胡辛侵略科威特的行爲，另一方面也要求美國停止戰爭行爲，因此其立場介於親美、反美兩大派系之間，在將來可能成爲約旦與伊拉克回到阿拉伯世界主流事務的中介者。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在一九八八年之後在聯合國大會上宣佈放棄恐怖主義、遵守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二四二號與三三八號

註⑧ Frederick W. Axelgard, *A New Iraq? The Gulf War and Implication for U. S. Policy*, 1988,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Washington Papers 133, Praeger, New York, pp. 14-8.

註⑨ *Ibid.*, p. 71.

註⑩ Anthony H. Cordesman, *op. cit.*, pp. 94-5.

決議案、承認以色列的生存權，可以被視作脫離了原先激進的立場。但是由於戰爭時散居中東各處的巴勒斯坦人受到胡辛鼓舞，形成一道很難由巴解總部控制的潮流，因此巴解組織民族議會（Palestine Liberation Council）主席阿拉法特（Yassar Arafat）的立場便顯得較傾向伊拉克。巴勒斯坦人的各種組織非常複雜，多數的小組織並不完全聽令於阿拉法特，波斯灣戰爭之中便有自行對以色列發動攻擊者。這種攻擊行動，使得戰爭之後，各親美國家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極不友善，認為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已經失去它的信譽。親美國家對巴解的態度，在處理以、阿糾紛的和會上將表現出來，沙、敘、埃等國，將在短時間之內不會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視為代表全體巴勒斯坦人的唯一合法組織，也讓以色列拒絕與巴解會談的立場不受親美國家的挑戰。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爲了改變這種不利的國際形勢，也爲了不要在以、阿之間的會談中被完全排除其對巴勒斯坦人的代表性，被迫採取低姿態，作了空前的讓步，願讓非巴解官員的巴勒斯坦代表與以色列談判，也願讓以色列劃定未來巴勒斯坦國的疆界。①巴解發言人夏里夫（Basam abu-Sharif）在會談之前便宣佈讓步，很明顯的解釋了巴解（或其領袖阿拉法特）在泛阿拉伯政治事務上已經失去了以往的地位，巴勒斯坦人建國一事，也只有任憑以色列、美國、埃及、敘利亞的宰制了。

另外一個阿拉伯世界值得紀錄的變化，就是阿拉伯世界團結一致對付以色列的神話打破了。當伊拉克佔領科威特而爆發波斯灣危機之後，胡辛便提出巴勒斯坦問題的對等解決，以希望將波斯灣對峙的局面演化成以、阿之間的對抗。但是主要反伊的阿拉伯國家，如埃及、敘利亞、沙烏地阿拉伯等，絲毫不爲所動。美國對伊拉克發動攻擊之後，伊拉克也一如預料中的對以色列展開飛彈攻擊，但是這攻擊行動也未改變埃、敘、沙等國的基本立場。甚至地面攻擊展開之後，胡辛獲得巴勒斯坦人的廣泛支持，但是埃及和沙烏地的軍隊依然加入對伊拉克的攻擊行動。這些都讓世人瞭解阿拉伯世界中巴勒斯坦迷思的脆弱，巴勒斯坦問題也不再是一項團結阿拉伯國家的精神象徵，這對巴勒斯坦人堅持其建國的合法權力有很大的負面影響。而阿拉伯國家之間大舉兵戎相見所結下的冤仇，以及巴勒斯坦人民對美國、沙烏地阿拉伯、埃及的怨恨的化解，只有賴這些國家在中東問題的國際和會上能否迫使以色列在佔領區問題上讓步而定。

戰爭之後，波斯灣地區的權力消長之中，由保守皇室組成的海灣合作理事會地位明顯提高。其原因除了戰勝伊拉克並將之大幅削弱之外，最主要的，是這些國家能够獲得西方強權在軍事上的大力支援，不必再仰賴伊拉克作爲抵抗什葉基本教義派革命輸出的屏障。

此外，地位最明顯上升的國家，要屬敘利亞。在兩伊戰爭之中，敘利亞因爲大力支持伊朗而與海灣合作理事會產生嫌隙，但是在波斯灣危機爆發之後，敘利亞便與美國、埃及、沙烏地阿拉伯等採取一致的立場，而贏得各親美國家的感激，這保

註① 自立早報，民國八十年三月十四日，第十版。

證了敘利亞在戰後的波斯灣地區的特殊地位。在戰爭之中，美國不斷提到成立區域安全組織，而此區域安全組織的基本成員便是海灣合作理事會的六個成員國。但是這六國的人口稀少，地面武力相當有限，而敘利亞是阿拉伯世界中武力較為強大者，（見表二）因此便可以成爲這安全體系的骨幹。戰爭結束後不久，主要反伊拉克的八個阿拉伯國家的外長在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集會，發表大馬士革聲明，一方面加強這些國家的經濟政治合作，另一方面則以敘利亞和埃及的軍隊作爲「阿拉伯和平部隊的核心，爲保障波斯灣地區各阿拉伯國家的安全與和平，形成一個足可確保整體安全的模式。」^⑫這項聲明，將敘利亞在波斯灣地區的駐軍合法化和永久化，也正式的使敘利亞成爲波斯灣地區的強勢國家。實際上，這些國家外長在大馬士革集會並發表如此重要的聲明這一件事，就足以顯現阿塞德總統在波斯灣地區和泛阿拉伯事務上的影響力。

表二：波斯灣地區國家軍力比較：一九九〇（九一）

	總兵力 (千人)	陸			軍			海		空		軍 戰機	人口 (千人)
		人數(千人)	坦 克	運 兵車	大 砲	人 數	艦 隻(各型)	人 數	戰 機				
伊拉克	一、〇〇〇	九五五	五、五〇〇	六、〇〇〇	三、七〇〇	五、〇〇〇	六〇	四〇、〇〇〇	六八九	一九、〇八六			
伊 朗	五〇四	三〇五	五〇〇	五〇〇	八〇〇	一四、五〇〇	五五	三五、〇〇〇	一八五	五二、〇四九			
沙 烏 地	六七·五	四〇	五五〇	一、一〇〇	四七五	九、五〇〇	四六	一八、〇〇〇	一八九	一四、〇六二			
巴 林	六	五	五四	一〇三	二二	六〇〇	一三	四五〇	二四	四八六			
卡 達	七·五	六	二四	一六八	一四	七〇〇	一〇	八〇〇	一八	四二〇			
大 公 國	四四	四〇	二〇七	五一〇	九七	一、五〇〇	二〇	二、五〇〇	九一	一、六六六			
阿 曼	二九	二〇	七五	六	七五	二、五〇〇	一八	三、〇〇〇	五七	一、四九二			
敘 利 亞	四〇四	三〇〇	四、〇〇〇	一、五〇〇	二、一八六	六、〇〇〇	三七	四〇、〇〇〇	五五八	一、二、三八三			
約 旦	八五	七四	一、一五〇	一、一六〇	三二六	二、五〇〇	一	一〇、〇〇〇	一〇四	四、一四〇			
以 色 列*	一四一	一〇四	四、二八八	五、九〇〇	一、三五九	九、〇〇〇	七七	二八、〇〇〇	五五三	四、五七九			
科 威 特	二〇	一六	二四五	二〇〇	七二	二、一〇〇	三二	二、二〇〇	三五	二、〇三七			

* 以色列的軍力也包括爲數約一百的核子彈頭，以及載運這些彈頭的中程飛彈。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90-1991, 1990*, Brassey's, Great Britain, pp. 100-120.

此外，伊拉克本身發生的變化也足以對波斯灣地區權力分配產生深重的影響。伊拉克在戰敗之後，各地的反抗運動風起

註⑫ 自立早報，民國八十年三月七日，第十版。

雲湧，危及這個國家的完整性。雖然胡辛仍然擁有相當數量的軍隊，也可能足以應付其國內的政治危機，但是假設巴斯黨政權遭到反抗運動的推翻，或胡辛本身遭到其軍事將領的政變推翻，而新政府無法控制局面時，伊拉克勢必成爲國內各派系與波斯灣地區各國權力角逐之地，動盪局勢可能持續很久。

伊拉克各地的動亂之中，什葉派的反抗運動最爲重要。在伊拉克的人口之中，約有百分之六十屬於什葉派，和在政治上居絕對優勢的遜尼派在信仰上雖然都屬回教，但在傳統上由於對於先知默罕默德繼承人的爭執而引起的紛爭，以及什葉派遭到遜尼派迫害等歷史情結，仍然深植兩派心目中。這種信仰上的派系分裂，很不幸的又與社會階層的問題相結合，在地中海以東的阿拉伯國家中，（如黎巴嫩、伊拉克、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葉門等）什葉派的人口多數是中下階層、受壓迫者，因此什葉派的理念長久以來就代表著受壓迫者爭取正義的呼聲。在一些較大的都會區，例如巴格達、貝魯特等，成爲吸引窮困什葉民衆尋找較高收入的地方，因此，在這些大都會區周圍都形成什葉派的貧民窟，也成爲傳播回教基本教義的大本營。

伊拉克自一九六八年巴斯黨掌權以來，什葉派最激進和勢力最大的組織爲達瓦（al-Da'wa，其意爲「呼聲」），吸引了許多遭到政治經濟壓迫的什葉人士。伊朗發生宗教革命後受到鼓舞，更升高對政府的挑戰，展開對巴斯黨官員的暗殺行動，其中最嚴重的，就是在一九八〇年三月暗殺外長阿濟芝（Tariq Aziz）的事件。阿濟芝逃過一劫，但是事後達瓦組織的最高領袖沙德（Ayatollah Bakr al-Sadr）却被捕遇害，另外可能高達二十餘萬的什葉派人口也以勾結波斯人的罪名被集體驅逐至伊朗。^⑬

在這次迫害事件之後，達瓦以及其它什葉反對組織便將基地轉移至伊朗。雖然什葉的反對勢力有派系問題，但是在一九八三年，這些反對派系組成伊拉克回教革命最高議會（Supreme Council for the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q, SCIRI），由伊拉克南部什葉哈金家族的首領默罕莫德（Sayyid Mohammad Baqir al-Hakim）作爲這組織的最高領導者。這個聯盟組織在經濟、政治、軍事上都接受德黑蘭革命政府的大力支援，而其意識形態更是受到伊朗回教革命的鼓舞。^⑭在這種背景下，假設什葉派革命成功，伊朗對伊拉克的偌大影響力將無可置疑，這個回教激進陣線對保守波斯灣王國的挑戰與壓力將會更大，也更直接。

至於伊拉克北部庫德族的動亂淵源更深，而且由於民族顯然不同以及地理情況爲較爲複雜的山地，因此伊拉克政府對北

註⑬ Frederick W. Axelgard, *Iraq in Transition: A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trategic Perspective*, 1986,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Westview Press, Boulder, p. 28; Frederick W. Axelgard, 1988, *op. cit.*, p. 23.

註⑭ Shahram Chubin and Charles Tripp, *op. cit.*, pp. 100-4.

部庫德族所居住的地區的控制都相當勉強。在一九七〇年代初期，伊朗沙皇在軍事上大力支持庫德族的反抗運動，使巴格達政府窮於應付，逼使伊拉克在一九七五年和伊朗簽下相當屈辱的阿拉伯運河（Shatt al-Arab）邊界協定，才能獲得伊朗停止對庫德族的軍事援助的承諾。^⑮庫德族的反抗運動向來分裂成庫德民主黨（Kurdish Democratic Party, KDP）和庫德愛國聯盟（Patriotic Union of Kurdistan, PUK），這兩大派系有相當嚴重的權力糾紛，但是建立獨立國家的願望則一致。在伊拉克的所有反對運動之中，庫德族是唯一在軍事上有潛力與政府相對抗者。

在波斯灣戰爭之後，敘利亞顯然加強對包括庫德族與什葉派在內的反抗勢力的支援。敘利亞與伊朗在柯梅尼革命成功之後便成為聯合對付伊拉克的盟國，因此阿塞德總統與伊朗聯合支持伊拉克反對勢力並沒有互相競爭或對抗的敵意包含其中。事實上，敘利亞很可能已經成為這些反抗勢力在阿拉伯國家中的幕後操控者。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一日，十七個伊拉克反對組織在黎巴嫩首都貝魯特集會，經過三天會議之後發表共同聲明，計畫成立臨時政府，並繼續戰鬥至胡辛政權被推翻為止。^⑯在波斯灣發生危機之後，黎巴嫩國內反對敘利亞干涉的主要團體，並受到伊拉克支援的奧恩將軍（Michel Aoun），因為胡辛受到美國軍力的牽制，而遭到敘利亞部隊的繳械，因而使黎巴嫩里達尼河以北（River Litani，以南為以色列自稱的全區域）地區都落入敘利亞的控制之下。伊拉克主要反抗組織在貝魯特集會發表聲明，可以說是受阿塞德的護翼的表徵。假設伊拉克的巴斯黨政府遭到推翻，成立新政府，或伊拉克陷入如黎巴嫩般的紛亂局面，敘利亞強大的軍力將發揮其它阿拉伯國家無法相比的影響力，敘利亞也可能如控制黎巴嫩一般，以支援各派系的方式控制伊拉克，敘利亞與伊朗的激進聯盟也將在地理上相銜接，這將是超乎美國或任何阿拉伯國家所能忍受的結局。這些分析，都足以說明敘利亞不但已經成為阿拉伯國家的強權，也有成為地區性超級強權的潛力，領導所有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相抗衡。

四、區域性安全體系安排和可能的問題

美國對於波斯灣地區安全體系安排最主要的文件，是國務卿貝克在二月初於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的證詞。在這份證詞中，貝克首先提到戰後安排的必要性：「……我國，以及與該次衝突有關的每一個國家，都在考慮著戰後的情況，並為未來預作安排；如果我們不如此做的話，就是不負責任。」^⑰但因戰爭尚在進行之中，有許多事情尚不明朗，戰爭的結局難以預測，

註⑮ Axelgard, 1986, op. cit., pp. 30-1; Amitav Acharya, *U.S. Military Strategy in the Gulf, 1989*, Routledge, London, p. 26.

註⑯ 自立早報，民國八十年三月十五日，第十版。

註⑰ James Baker, "U.S. Seeks Stability, Security in Gulf," Statement to House Committee, in AIT news summary files, EPF 301, February 6, 1991, p. 4.

而且戰爭本身及其結果對波斯灣以及整個中東地區的安全有重大影響，因此，「要為戰後的波斯灣，甚至是整個中東地區，描繪一詳細的藍圖，為時太早，也是不智之舉。」¹⁸

雖然美國無法在戰爭結束之前進行詳細的安全體系安排，但是却發表一些基本的概念，這些概念在貝克的眾議院外交委員會證詞中已經被勾勒出來：¹⁹

〔戰後〕的一項挑戰，將是波斯灣的安全。十年內經歷兩場戰爭之後，這一重要的地區需要新的且不同的安全安排。在我們的想法中，有三個基本的問題需要解決：安全安排的目的和原則；當地國家、地區組織、和國際社會的角色；戰後至地區穩定能達成為止或之後的軍事需要。我想我們已經可以找到一些可以達成協議的原則，包括：

對來自任何方面的侵略之嚇阻。

領土完整……。

爭端的和平解決……。

這些原則必須由當地國家優先展開行動，以避免爭端，嚇阻侵略。我們期待波斯灣的國家和區域組織如海灣合作理事會帶領建立執行新且加强的安全關係之體系。沒有任何該地區的國家應被排除在這個安排之外，戰後的伊拉克可能有重大的貢獻，而且伊朗也可作為波斯灣的主要強權。……

第二項挑戰，確定將是地區武力的擴散與管制，這包括傳統武器與大量殺傷的武器。一項令人恐懼的事實，是有些中東國家的傳統武力已經使多數的歐洲強權相形失色；五個中東國家的主要戰鬥坦克數目已經超過英國和法國所擁有的。嘗試改變這個地區軍事競爭和擴散之態勢的時代已經來臨，我們也應降低武器流入這已經過度軍事化的地區。

從貝克的證詞中所描繪的戰後安全體系安排，再參酌戰爭的結果，這個安全體系安排的面目已經相當清楚了。在大戰之後，美國不但將伊拉克的部隊逐出科威特，並且重創了伊拉克的作戰能力與經濟力量，但是却讓胡辛及巴斯黨體制繼續存在，統治戰後的伊拉克。而且由於戰後期伊拉克陷於苦戰，為求得生存，同意了一些相當屈辱的條件，如天文數字般的賠款，並限定各種物資的進口，讓伊拉克在可預見的未來無法逃避積弱不振和反抗紛起的命運。

美國在這種情形下對波斯灣地區安全體系的安排，除了建立以保守王國為基礎的安全體系組織以外，並無需美國駐留大量軍隊，但為了防止伊拉克與科威特或沙烏地阿拉伯發生邊界衝突而再起戰爭，可能要在美、伊達成停火協定之後，經由聯合國或阿拉伯國家聯盟的授權，在此一地區設立象徵性的部隊，作為敵對國家之間的緩衝，或在邊界設立中立區，並由聯合

¹⁸ Ibid.

¹⁹ Ibid., pp. 4-5.

國常駐觀察員監督中立區之不受侵犯。如前述，在波斯灣戰爭之後，反伊拉克的八個主要阿拉伯國家外長在大馬士革集會，以敘利亞和埃及的軍隊為主成立一個綜合性的聯盟體系，而這安全體系形成之策動者，顯然並非美國，而是阿塞德與慕巴拉克。毫無疑問的，敘利亞由於地理上的相近，已經成為波斯灣地區的強權國家，完全掩蓋了伊拉克所能扮演的任何角色。

在這些情況之下，美國必需擔心的，是敘利亞能否為地區安全作出貢獻，或只藉波斯灣戰爭的機會取得波斯灣地區強權的角色。美國當然希望因為阿塞德在戰爭之中與美方採取同一陣線而成為一個文明化的政權，軟化對以色列的態度，協助黎巴嫩境內美國人質的釋放，並在泛阿拉伯事務上協助保守的波斯灣王權國家。阿塞德雖然在波斯灣戰爭開始之後表明願意尊重以色列的生存權，但是敘利亞不但是軍力相當雄厚的阿拉伯強權國家，阿塞德的巴斯黨政權也是激進的泛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其對國內不滿份子的鎮壓殘暴程度不亞於伊拉克的巴斯黨，因此美國在戰後要如何對待敘利亞便需大費周章。事實上，貝克的國會證詞中便未提到敘利亞未來的地位。²⁰

如果布希總統為了感激敘利亞在波斯灣戰爭中與美國合作，而承認敘利亞在地區安全安排上的重大角色，便必須犧牲以色列的某些利益，在巴勒斯坦問題上作讓步，或在黎巴嫩的問題上同意敘利亞的安排；但若美國刻意排除敘利亞在中東和會上的角色，以保護以色列，或排除敘利亞在黎巴嫩的影響力，則被激化的敘利亞與伊朗有可能再度攜手合作，甚至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袖阿拉法特重修舊好，以其在波斯灣地區的地位對抗美國的利益，並加強對以色列的挑釁，完全取代積弱不振的伊拉克，這對美國的中東整體戰略也是很棘手的事。

另一方面，美國處理巴勒斯坦問題的態度也與美國與埃及和沙烏地阿拉伯之外的中東國家之間的戰後關係有密不可分的關連性。由胡辛所挑起的阿拉伯國家的反美、反帝國主義情緒的平息，只有靠美國在戰後的中東和會上對以色列加壓力，促其放棄佔領區的土地，讓巴勒斯坦人能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國家。如果美國不願或無法達成這個目標，則敘利亞可能善加利用阿拉伯世界的反美情緒，並運用回教基本教義散播不安定的種子。屆時，敘利亞與伊朗所形成的軸心不但對波斯灣地區國家形成莫大威脅，對美國在波斯灣地區的利益也是一大挑戰。

此外，美國對武器的管制也是戰後安全體系重要的一環，但美國的措施可能會遇上很大的阻力。美國爲了要加強海灣地區王國的軍力，必須鼓勵這些國家大量購買美國的高性能武器；另外爲了報答埃及的合作，也必須提供貸款購買武器；爲了感謝敘利亞的合作，美國將不阻止阿塞德自別的管道取得更好、更多的武器；而且爲了報答以色列不對伊拉克開戰之恩，美國不但要主動提供高科技武器，也無法拒絕以色列提出的武器購買清單。區域限制大量殺傷武器的協定將更爲困難，因爲以

色列已經擁有相當數量的戰略核彈，（見表二）阿拉伯國家（尤其是敘利亞）將據此作為談判的條件，讓美國無所適從。

從這些分析來看，無論波斯灣戰爭結果如何，美國都有必要加強波斯灣保守王權國家之間的軍事合作，並積極強化這些國家本身的軍事力量，降低對西方的軍事依賴。但是積極軍事化對這些國家的一種可能影響，就是軍人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大幅提高。在這些保守的社會之中，軍人是受過現代化紀律訓練的一群，對政治上一些腐敗的情形不會長期容忍，因此在戰爭之後，這些國家的政治如果沒有積極改革的話，逐漸累積權力和影響力的軍隊可能會考慮以改變的方式取代舊有的部落式統治。這些政變在阿拉伯世界的近代史上有多起實例可以追循，例如埃及一九五二年的政變，北葉門一九六二年的政變，伊拉克一九五八年的政變，利比亞一九六九年的政變等。^{②①}而且軍事政變的實例不止發生在中東地區，南美洲、非洲的許多國家都歷經多次的政變，都是值得注意的例子。保守波斯灣王國發生政變的可能性不容忽視，因為這些政變有可能使美國所大力支持的安全體系變成危害美國利益的轉折點。

五、結語

以上這些分析，都是以美國的利益為本位出發，以美國的觀點來看波斯灣地區的權力變化與安全體系的安排。這種出發點或許會招致帝國主義本位的曲解，但是事實上波斯灣戰爭是美國所一手主導的多國部隊對地區性衝突的支配行動。自波斯灣危機爆發以來，美國便主導全球的外交行動，對伊拉克的侵略行為展開譴責與各項制裁措施，例如運用聯合國的安全理事會，通過十二項決議案。^{②②}自波斯灣危機爆發之初，美國也迅速派遣大批軍隊，進入波斯灣地區，表現出它是全球唯一有此能力將大軍投射至海外任何地區發動大規模戰爭的強權國家。因此，美國對目前波斯灣地區戰爭的支配，是一項無法否認的事實，在戰爭之後對地區性安全體系的安排，也將居主導者的角色。因此，戰後的波斯灣安全體系，可以說是美國（或廣義的西方世界）的安全體系，由美國軍力支持的保守王國組成，防衛西方利益的安全體系。

美國支配地區安全之道德考量因素，不在於這是否一項事實，而是在於其支配是否完全著眼於弱小國家安全之需要，或是本身之利益考量。在伊朗發生革命，蘇聯出兵阿富汗之後，美國總統卡特便劃定波斯灣地區為美國重大利益範圍，任何對該地區的侵略行動都被美國視為對其利益的侵害。^{②③}在伊拉克侵略科威特之後，美國雖稱其出兵波斯灣為防衛沙烏地阿拉

註① 參見 George Lenczowski, *The Middle East in World Affairs*, 1980, 4th e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也參見 James A. Bill and Carl Leiden,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1984, 2nd ed.,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pp. 262-70.

註② 自立早報，民國八十年二月十九日，第四頁。

註③ William Slivers, *America's Confrontation with Revolutionary Change in the Middle East, 1948-83*, 1986, MacMillan Press, U.K., p. 87.

伯與建立冷戰之後的國際新秩序，但很顯然的，如果科威特沒有盛產石油，美國是否會出兵援助科威特著實令人懷疑。很簡單的問題，中共不願放棄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假設中共真有一天以某種藉口出兵攻擊台灣，美國出兵援救台灣的意願大概不是很高。因此，這場波斯灣戰爭，可說是一種利益衝突的戰爭，無關乎國際正義。

而且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當美國的某一聯盟國，或另一強權國家，甚至是美國本身，違反了國際法的規範，對其它弱小國家發動侵略戰爭或壓迫行為時，國際上有否任何對付的措施？如果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依然由五個強權國家主導，享有否決權，在上面所提到的情況下，能發揮什麼作用呢？畢竟在近代歷史上，由強權國家發動侵略戰爭的紀錄，要高過第三世界國家。美國雷根總統任內在尼加拉瓜港口佈雷，遭到尼加拉瓜政府在國際法庭上的控告並且敗訴，祇因美國國力強大，國際法庭無可奈何，這種事再度發生時如何處理？在布希總統所提出的國際新秩序的同時，是否也有考慮到這些因素呢？這都是發人深省的問題。

從布希總統的波斯灣戰爭之目標來看，美國有意殲滅伊拉克發動任何戰爭的力量，不但在經濟上要伊拉克賠償大筆債務，讓它在短期之內無法恢復，在政治上要逼迫胡辛下台或讓巴斯黨無法掌握政權，在軍事上，則不但要完全消滅伊拉克的化學武器、生物武器、核子武器的能力，也希望一舉消滅伊拉克的主力部隊。但是在這種形式的新國際秩序，似乎意味著美國要消滅任何對它國有威脅的國家，「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完全以美國強大武力建立的秩序。而且美國在波斯灣危機的路途中完全拒絕考慮巴勒斯坦問題的解決，如果戰爭結束之後伊拉克軍力被消滅了，但巴勒斯坦問題却遲遲沒有下文，或無法迫使以色列讓步，遵守聯合國安理會的第二四二號、三三八號決議案，那麼美國建立新國際秩序的信念便似乎要以帝國主義與霸權主義解釋較為恰當。

最後，一個值得深思的哲學問題，是否區域安定與安全安排應該揚棄自十九世紀以來主導國際政治的「權力均衡」原則。政治學名家，也是一九七〇年代初期主導美國外交的季辛吉(Henry Kissinger)便曾撰文批評布希總統想要以美國強大的軍力主宰全球事務以維持國際局勢的穩定，他認為美國因為經濟能力的限制，以及各種複雜的地區事務，美國不能妄想要以波斯灣行動作為建立冷戰後的新國際秩序的模式；美國的波斯灣行動所以受到全球的支持，乃是因為胡辛的暴行讓國際間無法忍受。以波斯灣地區為例，如果完全摧毀伊拉克的軍力，而讓伊朗和敘利亞失去制衡者，便有可能造成這兩個國家對波斯灣的主宰，對區域安定反而有負面的影響。季辛吉也提到美國為了維持國際穩定，却没有能力完全主宰地區事務，將來勢必回到權力均衡的觀念。²⁴這種說法和布希總統所揭櫫的理想有相當程度的衝突。到底往後美國能否依賴西方武力主導地區的和平穩定，或必須走回權力均衡的老路，是一值得深切觀察的問題。

註²⁴ 中國時報，民國八十年二月二十二日，第四頁。